



主编 曾繁仁
副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秦文通

祁海文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主编 曾繁仁

副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秦 汉 卷

祁海文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秦汉卷/曾繁仁主编; 祁海文
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209-09829-8

I. ①中… II. ①曾… ②祁… III. ①美育—思想史
—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G40-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3900 号

责任编辑 胡长青
助理编辑 王 菲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秦汉卷

曾繁仁 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副主编
祁海文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70mm × 240mm)
印 张 2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09829-8

定 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秦汉美育思想的思想文化背景 1

第二节 秦汉美育思想的历史分期 16

第三节 秦汉美育思想的基本问题 33

第二章 《吕氏春秋》的美育思想 51

第一节 秦文化与《吕氏春秋》 51

第二节 “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与“声出于和，和出于适” 56

第三节 “衷音之适”与“托于音乐以论其教” 62

第四节 “大乐”“适音”与“养性”“全天” 69

第三章 陆贾的美育思想 81

第一节 “道术”论与人性论 82

第二节 以“仁义”为核心的教化论 85

第三节 “治情性”的修养论 89

第四章 贾谊的美育思想 95

第一节 “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的教化论 96

第二节 以“君主”“太子”为对象的礼乐修养论 101

第三节 以“道德”为根基的“六艺”之美 111

第五章 《淮南子》的美育思想 118

第一节 社会教化论上的儒道对立 120

第二节 人格修养论上的儒道“相绌” 128

第三节 礼乐观的冲突与融合 139

第四节 艺术论的美育意味 148

第六章 董仲舒的美育思想 160

第一节 礼乐教化与“更化” 161

第二节 礼乐的功能与“制作” 167

第三节 “贪仁之性”与“王化” 174

第四节 “天地之美”与“以中和养其身” 182

第七章 《礼记·乐记》的美育思想（上） 189

第一节 《乐记》的作者及成书时代 189

第二节 “本之情性”与“制之礼义” 202

第三节 “反情以和其志”与“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209

第八章	《礼记·乐记》的美育思想(下)	219
-----	-----------------	-----

第四节	“礼乐”与“治道”	219
第五节	“礼乐”与“德音”	226
第六节	“礼乐之说,管乎人情”	233
第七节	《乐记》的地位与影响	241

第九章	扬雄的美育思想	249
-----	---------	-----

第一节	“尚智”精神与美育倾向	250
第二节	“谨其教化”的礼乐观	256
第三节	“君子全其德”的“修性”论	261
第四节	“弭中而彪外”说的美育蕴涵	268

第十章	王充的美育思想	276
-----	---------	-----

第一节	“情性”与“教化”	278
第二节	标榜“鸿儒”的人格理想	285
第三节	“真美”论的美育精神	291
第四节	“为世用”说的美育问题	297

第十一章	王符的美育思想	304
------	---------	-----

第一节	“和以养性”的元气论	304
第二节	“务治民心”的教化论	307
第三节	“德近于圣”的修养论	311

第十二章 荀悦的美育思想 314

第一节 作为“政之大经”的“法教” 315

第二节 性有“三品”与“法教”化民 318

第三节 “尽性”以“至圣”的“敦学” 323

第十三章 徐幹的美育思想 327

第一节 “治学”与“情性”修养 328

第二节 “法象”论的美育意味 333

第三节 “艺”的构成与美育功能 337

第四节 “贵言”论的美育意味 344

参考文献 347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秦汉美育思想的思想文化背景

秦汉美育思想是先秦美育思想的发展。与先秦美育思想相近,秦汉美育思想基本上是通过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思考表现出来的,与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一、从《吕氏春秋》到董仲舒的会通百家、统一思想进程

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封建帝国。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开创了历时长达 420 余年的汉帝国。秦汉时代历时 440 余年,期间虽有公元前 206 年至前 202 年的楚汉战争和公元前 8 年至 23 年的王莽新朝,但政治大势以统一为主。秦的统一为时仅 15 年,更像是汉统一的前奏和基础奠定时代。从政治制度上看,秦废除西周的封建诸侯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汉承秦制”,最初封国与郡县并立,此后逐渐剪灭封国,完成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从思想文化发展来看,秦汉时期的整个发展趋势也以统一为主。秦的兴起和统一六国期间,已经出现了结束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局面以实现思想的统一的思想文化趋向。这一趋向到汉初仍在延续,直至汉武帝时才最终“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①,完成思想文化的统一。此后

^①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2 页。本卷下引《汉书》,均据此书,仅注篇名。

直至汉末，思想文化基本上是在儒学领域内发展演变。因此，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看，秦与汉都有很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秦统一后，在思想文化上仍维持着以基于法家思想的“法教”为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学”存在的格局。秦统一后期的“焚书坑儒”，禁“私学”，尚“法教”，只是在双方矛盾激化之后的政治专制之举。秦襄公在东周初以“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①而被周平王封为诸侯，但历来被中原诸侯视为“戎夷”。战国初，秦孝公任用商鞅为政，变法图强。“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为早期法家思想家，商鞅的明“法令”^②、“贱游学”（《商君书·壹言》）等思想对秦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晚期秦简中的大批法律文书，是其突出表征。^③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入秦，深受秦始皇赏识。但商鞅的“贱游学”之说，在秦国实际并未被认真采纳过。为了与中原诸侯相抗衡并统一天下，秦国大量任用了来自其他诸侯国的“游学”之士，因而也就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游学”之士所带来的“私学”的存在。战国晚期，儒学大师荀子曾在秦昭王时“入秦”，既赞赏秦国民风朴厚，官吏“恭俭、敦敬、忠信”，又批评秦“无儒”^④。但秦统一之后，秦始皇的博士中就有淳于越这样的儒生。即使在“焚书坑儒”之后，秦二世的博士中也还有后来为汉高祖制定朝仪的儒学博士叔孙通，以及汉初传《尚书》的伏生等。正因为有“私学”的存在，也才会出现《吕氏春秋》这样一部以

①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8页。本卷下引《史记》，均据此书，仅注篇名。

②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定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0页。本卷下引《商君书》，均据此书，仅注篇名。

③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强国》，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304页。本卷下引《荀子》，均据此书，仅注篇名。

“集论”形式囊括、统合百家学说的著作。战国后期，诸子学说在相互批判之中互相影响、吸收的情况渐增，已显露出学术由分向合转换的迹象。《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等，都表现出总结百家学说的倾向，也似乎都有以一家一派学说取代“百家争鸣”的意向。但它们的门户之见、对他家学说的批判意识都过于强烈，可以说只是提出了学术由分到合的时代课题。《吕氏春秋》的主持编撰者吕不韦身居相位，其时秦国独强，列国衰微，天下一统的趋势愈加明显，因此，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显然有统合百家学说，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国家确立统治思想的意向。虽然该书的思想似乎从未，实际也不大可能在秦国政治上得到实施，但是作为思想统一的尝试，也显示出秦汉时期思想统一与政治统一相关联的时代课题。因此，《吕氏春秋》对秦汉思想发展来说，具有开篇意义。秦统一后期，以儒学为代表的“私学”与“法教”在政治制度问题上矛盾激化，成为“焚书坑儒”事件的导火索。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以法律的形式禁“私学”，强制推行“法教”，实质是以专制政治手段正式确立秦的统治思想。随着秦的迅速灭亡，这一统一思想政策以失败告终。

汉初，鉴于秦的残酷统治和秦汉之际连年战乱对社会生产的极大破坏，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汉书·循吏传》）这就是所谓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的主要来源是先秦道家思想，道家本以“自然无为”为基本观念，但在战国百家争鸣的背景下，道家吸收、融会了其他学派思想，“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史记·太史公自序》），逐渐关注现实政治问题。汉初思想家陆贾、贾谊等虽以儒家思想为主，提倡“仁义礼乐”，但也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道家“无为”思想。汉惠帝时，名臣曹参任齐国相，接受黄老学者盖公的“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建议，“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此后，曹参继萧何任汉丞相，“举事无所

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受到百姓的歌颂：“萧何为法，颀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继曹参后任左丞相的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陈丞相世家》）。景帝、武帝时期的名臣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史记·汲郑列传》）。汉文帝、景帝时期，黄老之学在西汉政治上达到鼎盛。“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史记·礼书》）文帝窦皇后更是黄老之学的虔诚尊奉者，景帝继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道家思想、黄老之学在南方诸侯国中影响更大。1973年，长沙马王堆不仅出土了两种写本的帛书《老子》，还出土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4篇古佚书，被认为是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的重要著作。^①汉景帝、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一书，是西汉前期道家思想集大成著作。该书的编撰宗旨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②，显然是要贯通天地之理而以“道德”来“经纬人事”。《淮南子》是《吕氏春秋》之后出现的又一部试图统括、综合先秦诸家学说以统一思想著作，它主要立足于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思想，并基于此批判、吸收儒家等诸家学说。以道家为主，以儒家为辅，兼融并包其他诸家思想，是《淮南子》的基本学术倾向。刘安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入朝，向汉武帝进献所作之《淮南子》（史称《内篇》），他在《淮南子·要略》篇中称其书为“刘氏之书”，显然有以《淮南子》的思想为汉王朝统治思想之意。

汉初黄老之学风行数十年，对于恢复社会生产、维持政治稳定、培

① 参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②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要略》，中华书局2013年第2版，第851页。本卷下引《淮南子》，均据此书，仅注篇名。

育学术文化等确实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历代称道的“文景之治”，黄老之学功不可没。但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因循放任之风，使其无力应对汉初以来的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深刻矛盾，以及匈奴强盛威胁西汉王朝等重大社会问题。汉文帝时期，贾谊就对黄老之学的“无为”“无动为大”进行激烈批判，^①主张实施“尊卑大小，强弱有位”（《新书·礼》）的儒家礼治。另一方面，在黄老之治下，秦代“焚书坑儒”中受到打击最大的儒家经学在汉初逐渐得到恢复。汉高祖时，有故秦博士叔孙通制定朝仪，使刘邦第一次体会到做君王之乐。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秦“挟书律”，儒家六经之学陆续得到恢复和传授。汉文帝时，韩婴以治《诗》为文帝博士，太常还曾派遣晁错到齐国就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汉景帝时，辕固生治《诗》，胡毋生、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均被置为博士。地方诸侯如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刻意收集民间藏书，推崇儒家经学，“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汉书·景十三王传》）。《汉书·儒林传》指出：“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随着儒家社会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的逐渐增强，它与黄老之学的矛盾不可避免。辕固生和黄老学者黄生曾就“汤武受命”问题在汉景帝面前展开过一场激烈辩论，双方意见相左，僵持不下，汉景帝只好下令停止争论。儒学甚至开始公然挑战当政的黄老之学。窦太后有一次问辕固生以《老子》一书为何如，辕固生说：“此家人言耳。”这一回答触怒了崇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被逼得去和野猪决斗，幸得汉景帝解救才免于难。

汉武帝继位，更加倾向儒学。《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

^①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孽产子》，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8页。本卷下引《新书》，均据此书，仅注篇名。

140)，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是“罢黜百家”的先声。武帝的重臣如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俱好儒术”，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是经学大师鲁申公的弟子，他们“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汉书·窦田灌韩传》）。赵绾等后来向武帝提议架空窦太后之权，遭到窦太后的强烈回击，赵绾、王臧被下狱，窦婴、田蚡被免官。建元五年（前136），窦太后生命垂危之际，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黄老之学失去了最后的政治保障。武帝于次年改元元光，以“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武帝纪》）等为题策问贤良。以治《春秋》公羊学为博士的董仲舒先后向武帝上“天人三策”，主张“更化”，以“礼乐教化”的“德教”为治国之道，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还明确提出以儒家之学统一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建议和汉武帝登位之后一系列“隆儒”措施若合符节，因此，尽管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非是直接受到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影响，但董仲舒毕竟最早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这一主张，对于武帝确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基本国策无疑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所以，《汉书·董仲舒传》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也因为“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对先秦儒学的新的阐释和发挥确立了在汉代思想史上“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地位。

总之，董仲舒的出现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标志着自《吕氏春秋》以来的综括先秦百家学说，为统一的封建帝国确立统治思想的思想运动最终以儒家思想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统治地位而宣告结束。自此以后，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走上了以儒家为主体，主

要在儒家思想领域内发展的道路。

二、儒家经学从西汉到东汉的发展

汉武帝在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之时，接受丞相卫绾的建议，罢去了名家、法家、纵横家等的参政资格。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此前自文帝至景帝，儒家经学已有《诗》《书》《公羊春秋》博士，武帝新立了《易》《礼》博士。约在此前后，又罢去了文帝以来所立的诸子、传记博士，可以说已经确立了儒家经学在官方学术体系中的“独尊”地位。在元光元年的贤良对策中，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京师办太学。此后，丞相公孙弘上书武帝，请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令地方郡国县道邑选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诣太学，得受业如弟子”。公孙弘还建议政府选博士官所培养的“通经”弟子任官员，“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汉书·儒林传》）。这些都得到武帝的肯定并付诸实施。武帝时的这些措施，改变了自战国以来博士只是备顾问，虽传授弟子但具有“私学”性质的局面，使儒家经典成为官学教育的唯一内容，研究、传授经典，培养候任官员，并以此化民成俗，成为官学教育的基本目的，儒家思想由此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和主导。

汉武帝时，儒家经学取得了学术上的“独尊”地位，但对政治的影响还颇为有限。武帝本人的政治作风更近乎法家的严刑峻法，思想上也颇受神仙方术影响。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和支持对匈奴战争等，武帝更任命桑弘羊这样颇具法家色彩的人物主持经济，推行盐、铁、酒官营，以及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为解决武帝时期专制政策和穷兵黩武引发的社会问题，下诏命各郡国举贤良文学，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史称“盐铁会议”。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等基于儒家立场激烈批判武帝以来重商轻农的经济政策、轻“教化”尚法制的政治风尚，鼓吹“义利”之辨和天人感应，体现了西

汉中期以后学术与政治的突出矛盾，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独尊”地位。继起的汉宣帝同样推行严刑峻法之治，太中大夫盖宽饶批评说：“方今圣道寢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宣帝本人也对此直言不讳：“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儒学自武帝时取得官学地位以来，一方面受到政治领域内法家倾向的冲击，另一方面其内部各经各派纷争不断。甘露三年（前51），为调和经学内部纷争，加强思想统治，汉宣帝下诏召集二十多位经学名臣和经学学者在长安未央宫石渠阁“讲五经同异”，由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宣帝“亲称制临决”（《汉书·宣帝纪》），史称“石渠阁会议”。这是自武帝“表章六经”以来首次会聚各经各派大师共同讨论五经异同，树立了皇帝在经学领域的最高权威，促进了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同时，经学博士也由武帝时的“五经七博士”发展到“五经十四博士”。此后，虽迭经变化，但终汉之世，一直维持着“五经十四博士”的格局。

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民间藏《诗》《书》等，“博士官所职”虽未焚，但也多在秦末战乱时被付之一炬。西汉经学所用的经书文本，大抵是汉兴以后经师们根据记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录的，故称“今文”。武帝在立五经博士时，曾下诏广求民间藏书。地方诸侯如河间献王对此更为热衷，“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汉书·景十三王传》）此外，武帝时有孔壁藏书发现，鲁国淹中发现了《礼》古经。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①。这些陆续发现的古文经书，不仅在民间得到研究，而且被献之朝廷，藏于秘府。西汉末期，古文经学势力上升，开始挑战今文经学的权威，引发了儒家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西汉元帝、成帝期间的著名

^① 黄晖：《论衡校释·正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4页。本卷下引《论衡》，均据此书，仅注篇名。

学者刘向与其子刘歆先后主持整理、校订皇家秘书，得见大量古今经书，对其价值逐渐有了更高的评价。至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上书奏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哀帝命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汉书·楚元王传》）。汉平帝时，王莽当政，支持刘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均被立为官学。王莽篡汉自立后，又依古文经书《周礼》进行政治改革。随着王莽新朝的迅速灭亡，古文经学丧失了官学地位。但经学今古文之争并未因此停止，在东汉光武帝、章帝以至桓、灵二帝期间都曾发生过几次规模大小不等的争论。古文经学也在这些论争中地位逐渐上升，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今、古文遍注群经。此后，今文经在东汉末年以后历经战乱逐渐失传，古文经学取得儒家经学的统治地位。

儒家在西汉武帝时取得“独尊”地位，虽是时势使然，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居功至伟，他所从事的《春秋》公羊学研究在西汉经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核心，热衷用“符命”和“灾异”解释经义，为原始宗教迷信向经学的渗透留下的缺口。“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此后，儒学为了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力，限制君权的过分膨胀，也常以阴阳灾异之说介入政治。班固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说：“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经学的神学化，导致了东汉末期谶纬之学的流行。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①的神秘预言，纬是托名孔子的对儒家经义的神学解释著作。两者都有很久远的渊源，但在西汉哀、平之际随社会动乱和经学今古文之争等合流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当时流行的谶纬之书很多，谶书主要围绕着《河图》《洛书》产生，另有

^①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论语》讖。纬书名目更多，儒家六经，外加《论语》《孝经》等，都各有数目不等的纬书。讖纬之学神秘、繁杂，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论是其思想基础，纬书中大量引用《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等书中的文句和论述。讖纬之学的社会影响非常巨大，王莽篡汉主要就是通过伪造讖书、假作隐语的方式进行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之所以在灭掉王莽后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了讖纬。王莽、刘秀称帝后，都曾组织编纂过纬书，“宣布图讖于天下”^①，试图统一思想。尽管东汉一些著名学者如桓谭、郑兴、尹敏、张衡等都曾批判过讖纬之学的宗教神秘主义，但讖纬之学对汉代今古文经学都有深刻影响，汉末郑玄不仅注释过纬书，甚至援引讖纬之说注释儒家经典。

儒家经学从西汉发展到东汉，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今古文经学的矛盾，讖纬之学对经义的淆乱，章句烦多导致学者无所适从，加之一些学者突破师法别求新义等。为了解决经学发展问题，建初四年（79），东汉章帝仿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之故事，“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欲使诸儒共正经义”，章帝“亲称制临决”。这次会议的记录，后经班固整理，编为《白虎通义》。《白虎通义》将会议的讨论内容归纳为四十四个问题，涉及以君主专制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伦理、军事、经济等众多方面，都引用儒家经典做出了权威性的解释。其基本理论倾向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的“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论、“三统”论等，并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构架论证了君主专制之下的宗法等级的政治秩序和相应的伦理规范。但白虎观会议并没有解决经学今古文之争，讖纬迷信反倒由此更进一步向经学渗透。它强化了经学与政治的结合，也付出丧失学术独立性的代价。以白虎观会议为起点，儒家经学开始走向衰落。

^①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页。本卷下引《后汉书》，均据此书，仅注篇名。